

一副铜镇尺背后的历史烟云

□郭学军



在文房器物的世界里，铜镇尺以其独有的韵味和深厚的历史背景，向来备受藏家青睐。而笔者所珍藏的这一副铜镇尺（如左图），不仅承载着往昔的故事，更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引领我们穿梭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感悟革命志士间那份真挚的情谊。

这副铜镇尺，形制规整，呈长方体状，左右两边尺寸一致，均为长11厘米、宽2.1厘米，每只重150克。其质地厚重，铜色古朴，表面泛着一层温润如玉的光泽，静静地诉说着那些被尘封的岁月。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面篆刻的五个楹联——“乾坤容我静，万物任他行”。

母亲那盏煤油灯

□詹敬鹏

煤油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盏灯，是一段历史，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难以挥去的乡愁。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乡下农村，尚未通电，煤油灯成了家家户户夜晚的唯一光亮。我家的夜晚，总是被母亲那盏简单而朴素的煤油灯点亮。它由一个小小的玻璃瓶灯座、一个玻璃灯罩，以及一根棉线布条组成。每当夜幕降临，母亲便会轻柔地掀开灯罩，用火柴点燃棉线，再轻轻合上灯罩。瞬间，微弱的火光便在老屋中摇曳，带来温暖与光明。

煤油灯的光，虽不及电灯明亮，却别有一番韵味。它的光线柔和而温暖，宛如母亲的手轻轻拂过脸颊。每到晚上，在那盏煤油灯的映照下，老屋内的一切都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显得温馨而宁静。我常常坐在煤油灯旁，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她或是在为我缝补被山上树枝划破的衣裳，或是在为我纳鞋底做鞋，或是在准备第二天的饭菜。我少年时，既要放牛又要砍柴，衣裳和鞋子总是破旧不堪，因此母亲时常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尤其是纳鞋底，最为费工夫。我曾好奇地问母亲为何纳鞋底时总要将针头在头发上蹭几下，母亲笑道，这是祖上传下的经验，发油能润滑针头，使纳鞋底更快捷。那时，我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光影中，听着母亲的唠叨，感受着家的宁静与安详。

然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母亲深夜半夜为我做的的那顿刻骨铭心的夜餐。

有一次，我和好友到山里砍柴，直到半夜才回家。母亲急得点着小马灯进山找我们。待我挑着重担回到家时，已是深夜12点。我喝了一碗稀饭便睡了。可到了凌晨两点多，我饿得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惊醒了母亲。她轻声问我：“怎么还不睡？明天还要上街卖柴呢。”“我饿。”我轻声答道。

母亲没再多问，轻轻下床，披上衣服，点亮煤油灯，打开家里唯一的家具——木箱子。她左手托着锅盖，右手从角落拿出一个米袋，将米倒进了锅里。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厨房传来洗锅声和柴火燃烧声。不一会儿，母亲一手端灯，一手端碗白米饭来到我床前：“快起来，别把弟弟弄醒了。把这碗饭吃了，好好睡一觉，明天还要早起卖柴。”

我坐起，披上外衣，在那盏煤油灯淡淡的金黄色灯光下，从母亲手中接过沉甸甸、香喷喷的米饭。尽管没有下饭菜，但我吃起来却觉得特别香、特别甜。我知道，这米饭是母亲饿着肚子用野菜充饥，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那是我少年时代最香甜、最好吃的夜餐。

如今，煤油灯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每当我看到类似的煤油灯，便会想起母亲的那盏灯。因为，母亲那盏煤油灯，对于我来说，既是我少年时代的守护者，又是我对母亲的一种深深的思念，更是我一生中记忆中的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行楷字体工整规范，笔画间刚劲有力，又不失灵动飘逸，尽显书写者深厚的书法造诣。在右侧镇尺的上端，刻有“赠甫仁兄清赏”的字样，而左侧镇尺下方，则落款“弟杨慕时持赠”。

这副铜镇尺，是笔者于2013年在北京市潘家园古玩城的一家店铺中邂逅。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副铜镇尺时，便被它古朴的外观和上面的文字所吸引。经过一番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我逐渐了解到铜镇尺背后那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受赠者“甫仁”，即陈甫仁（1882—1911年），又名陈文友，广东兴宁市石马镇刁田村人，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陈甫仁是一位英勇无畏的革命先驱，他在清末那个国家危亡、民族蒙辱的黑暗时期，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誓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陈甫仁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各种反清起义活动，在黄花岗起义中，他身先士卒，与战友们并肩作战，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毫不退缩。被捕后，他在狱中遭受了敌人的

残酷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坚守着自己的革命信仰，直至壮烈牺牲。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革命的道路，激励着无数后来者继续前行。

再看持赠者杨慕时（1889—1945年），河北盐山人，他是冯玉祥的重要幕僚之一。杨慕时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都有着卓越的才能和贡献。他跟随冯玉祥南征北战，为冯玉祥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决策出谋划策，在多个关键历史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有着独到的见解，还在政治协调、后勤保障等方面展现出非凡的能力。杨慕时与陈甫仁，一北一南，地域的差异并未成为他们相识相知的阻碍。他们因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而结缘，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彼此鼓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从这副铜镇尺的题字和落款中不难推测，杨慕时将此赠予陈甫仁，不仅是对这位志同道合的兄长的敬重与情谊的表达，更是对他们共同革命

信仰的坚守与传承。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革命志士们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危险，随时都可能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在共同的理想和奋斗中建立起来的，这份情谊显得尤为珍贵。这副铜镇尺，不仅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更是他们深厚情谊的见证。它或许曾陪伴着陈甫仁度过无数艰难的时光，在他伏案书写革命文书、策划起义行动时，默默地置于案头，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与力量。

如今，这副铜镇尺静静地躺在笔者的收藏柜中，但它所承载的历史烟云却从未消散。它如同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感受到革命志士们为了理想信念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陈甫仁和杨慕时，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故事，通过这副铜镇尺，得以流传下来，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生活。

江南，一个如诗如画的名字，蕴藏着无尽的温婉与柔情。在这里，山水相依，烟雨朦胧，恰似一幅缓缓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水墨画卷。灵动而富有诗意。每当夏风轻拂，柳絮飘飞之际，一场绵绵不绝的雨，便悄然降临在这片烟雨朦胧的水乡，这便是江南独有的梅雨时节。

梅雨，宛若一位含蓄温婉的女子，轻轻踏过青石板路，带着几分羞涩，几分柔情，将整个江南浸润在一片氤氲水汽之中。它不似春雨那般细腻轻柔，也不及秋雨的萧瑟凄凉，更没有冬雨的刺骨寒冷，梅雨，以其独有的温润与缠绵，诠释着江南夏日的韵味。雨丝，细细密密，悄无声息地织就一张巨大的网，轻轻覆盖在江南水乡的小巷、石桥与村落人家之上。屋檐下，水珠串串滴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那是大自然最质朴的乐章，让人心生宁静，忘却尘嚣。小巷深处，花伞乍下，行人或匆匆或缓缓，他们的身影在雨幕中若隐若现，让人仿佛置身于诗意盎然的姑苏的旧梦之中。

梅雨时节，亦是江南文人墨客抒发情感的最佳时机。他们或静坐窗前，听雨品茶，任思绪随着雨丝飘远；或挥毫泼墨，将眼前的景致化为纸上云烟，留下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让后人得以在字里行间，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温婉与哀愁。

我独自走在离家不远的红星河堤上，听风声雨声以及风中雨中的鸟叫声，那景致犹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河水在梅雨的滋润下更显活力，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不远处，一方荷塘映入眼帘，荷花亭亭玉立，偶尔有几只蜻蜓点水而过，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情趣。岸边，垂柳依依，绿意盎然，雨珠挂在嫩绿的叶尖，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勃勃生机。

荷花，又名水芙蓉，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她植于泥



一蓑烟雨任平生

张永生 摄

江南烟雨天

□鲁志超

淅淅之中，滋养于清水之间，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不仅仅是对荷花高洁品质的赞美，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的向往。荷叶紧贴水面，却不随波逐流；荷杆“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浑身带刺，生性倔强，宁折不弯。荷花娇艳但不失清纯，雍容大度却不哗众取宠，清香中透着谦逊，柔弱里带着刚直。荷花之美，不仅在于其外在的形态与色彩，更在于其内在的精神与品质。她内敛而不事张扬，奉献而不求索取，香消玉殒而风骨犹存，这才是荷的真正价值！

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苏轼初到颍州任太守。一日，他漫步到颍州西湖边，置身于四面依依垂杨与十里荷香的幽境之中，即兴写下：“四面垂杨十里荷，问言何处最花多。画楼南畔夕阳红，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

苏轼的一生宦海浮沉，跌宕起伏，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挫折，险些丢了性命。苏轼初到黄州时，内心充满了愤懑与失落。“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表面上写黄州鱼美笋香，实际上是自我解嘲。此时苏轼的心境处于极度的苦闷和迷茫之中。“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浪中。故人不复通消息，疾病饥寒疑死矣”，他被贬至此，政治前途渺茫，亲友联系减少，生活困苦，疾病缠身，对未来感到深深的迷茫和无助。

然而，苏轼很快就从困境当中调

整好心态，在经历了人生的寂寞沙洲冷后，苏轼的心境达到了一种成熟和豁达的境界。一次他在沙湖游玩时，忽逢大雨，同行的人均没带雨具，十分狼狈，雨过天晴后，苏轼联想到自己人生的坎坷，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就在这个时期，苏轼写下了《浪淘沙·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些作品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地位。

宋徽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秦观被贬衡州，苏轼也被获准从海南岛内迁。两个好友一个南迁一个北归，在途中相遇感慨万千。于是把酒言欢间，秦观写下了这首《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一句“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不甘。人生如同这风雨中的荷花，起起伏伏，有高潮有低谷，有落魄有风光。只要调整好心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看着眼前渐渐沥沥的雨丝，我不禁感叹：江南的雨，尤其是梅雨时节的雨，它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更滋养了江南人的心灵，赋予了这片水无尽的诗意与柔情。在这里，雨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是情感的寄托，是江南独有的韵味与风情。



铜陵市郊区的周潭镇，早在明清时期便是桐城东乡闻名遐迩的集镇。它面临着碧波万顷的枫沙湖与陈瑶湖，背靠

着连绵起伏的黄梅山与三公山，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山水风光旖旎，被誉为鱼米之乡。在集镇的东侧，巍然矗立着一座地标性的宏伟建筑——周氏宗祠。这座宗祠曾规模庞大，金碧辉煌，其门前广场宽阔无比，四周的民居与之相距百米之遥。宗祠的主体建筑囊括了头门、仪门、正大厅与寝厅等四座厅堂，以及一座独具特色的八角亭。此外，还有关帝庙、观音阁、罗汉堂和大王庙等附属建筑。然而，遗憾的是，在1954年的特大洪水灾害之后，这四座厅堂与庙宇由于种种原因相继倾颓，如今仅剩八角亭依然屹立，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氏宗祠始建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4年），坐落于周潭镇东边涧（雅称为潭溪）汇入枫沙湖的台地上。这里不仅自然景观引人入胜，还流传着诸多耐人寻味的人文故事与民间传说。据传，在宗祠的营建过程中，大量使用了黄色、红褐色以及碧玉色的琉璃瓦与瓦当。此事被好事者密报至安徽官府，称这些华贵建材乃皇家宫殿专用，民间建筑不得擅自使用，因此要求拆除周氏宗祠，并查办主事者。主事者得知此消息后，为避免嫌疑，立即派遣一位见多识广的族人携重礼，日夜兼程赶往京城，向在京为官的周潭施湾人周大璋求助，恳请他设法解决。

周大璋于雍正二年进士及第，官拜翰林院编修。为官前，他饱读诗书，满腹才华，曾在东边涧的碧梧堂设馆授徒，声名远扬。康熙年间的宰相、桐城人张英对其慕名已久，特遣家人将次子张廷玉送至碧梧堂苦读三年，张廷玉学业大进，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时，张廷玉已位居当朝宰相，周大璋胸有成竹地前往拜访张廷玉，禀报了在碧梧堂旁营造周氏宗祠的喜悦，并恳请其赐予墨宝。张宰相忆及往昔，面露喜色。周大璋趁机道明来意。张宰相略作思索后，宽慰周大璋，说明朝廷虽无明文规定，但民间建筑若与庙宇相关，如九华山、普陀山及杭州灵隐寺等，均可采用黄色、碧玉色、褐红色琉璃瓦。张廷玉欣然答应为周氏宗祠题写匾额与楹联，并为《周氏宗谱》作序，同时还为安徽巡抚修书一封，借此叙旧之情。随后，张贴周氏宗祠东墙增建了一座庙宇，对外宣称周氏宗祠为周氏宗庙，从而使得宗祠得以保持原貌，流传后世。

周氏宗祠的整体布局气势恢宏，庄重而华丽。祠堂的前厅，即头门，为一座两层高的官殿式建筑，高达10米，宽20米，进深12米。其墙体呈红色，屋顶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上嵌碧绿半圆筒状的琉璃瓦当作为飞檐。屋脊的正中竖立着葫芦状的瓷瓶剑戟大尖顶，四角飞檐下悬挂着铜铃，随风摇曳，发出叮当悦耳的声响。大门两侧安放着一对硕大的石鼓与两头威武的石狮，正上方则悬挂着一块黑字大匾，上书“周氏宗祠”，令人肃然起敬。头门的气势，真正起到了引领全局的作用。仪门是一座高大的厅堂，中间设有六扇开合的大门，装饰有铜环拉手，两旁设有侧门。前后共有8根廊柱。在举办清明祭祖活动或正月初二向祖宗拜年时，三门全开；平日里，则仅开一个侧门供族人祭拜与路人观瞻。正大厅作为祠堂的主体建筑，高6.66米，宽40米，进深15米。厅内分列着8根红漆顶梁大圆柱，是举办重大喜庆活动与修缮家谱的场所。最后是寝厅，这里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牌位。祭坛前摆放着传统的精美供桌，两边则陈列着精致典雅的礼仪祭器，是族人祭拜之地。在头门与仪门之间，有一片宽阔的庭院。庭院中央设有泮池，泮池上铺设着石桥，将池水分隔成东、西两个六边形水池，四周环绕着石雕栏杆。池水清澈见底，游鱼清晰可见，且终年不溢不涸。在仪门与正大厅之

间，左右分别建有义勇祠与节孝祠，四周环绕着花坛。

最具建筑特色与亮点的，当属正大厅与寝厅之间的八角亭。这座八角亭坐北朝南，面阔12米，进深7米，采用木质结构，以9根5米高的圆柱为支撑。其上部结构分为两层，第一层四角正檐与第二层四角正檐错开，构成了独特的八角形外观。亭盖铺设着黄色的琉璃瓦，亭檐则嵌有红褐色的半圆筒琉璃瓦当。梁架结构精美绝伦，斗拱上雕刻着虎面纹饰。内顶呈弧形，四周雕刻的狮虎形象栩栩如生，人物形象也活灵活现。整体结构精巧且装饰华丽无比。

周氏宗祠内悬挂着众多牌匾与楹联。仪门的上方，悬挂着由张廷玉题写的著名匾额“理学名家”，以此颂扬周氏周氏的远祖——北宋哲学家、文学家周敦颐，同时也寓意着要传承与弘扬老祖宗的家风与学风。两旁的门柱上，则镌刻着张廷玉撰写的名联：“凤山朝九子；鹤石行三公”。这副对联讲述了铜陵凤凰周与桐东鹤石周的一世祖孔嘉公与孔庄公，他们是周敦颐后裔中的同胞亲兄弟，本为一家。凤凰山面朝九华山，寓意着佛光将普照周氏的子孙后代，使他们能够成就大业。而鹤石山一脉相连的三公山，则是枞阳、庐江与无为三县的界山，寓意着周氏的子孙后代将繁衍发展，前程远大，后路宽宏。

正大厅后隔墙的正上方，横挂着一块由周大璋题写的匾——“濂溪望族”。周敦颐曾官至大理寺丞、国子博士，他在庐山莲花山下的小溪旁筑室而居，并取得道州故居濂溪之名来命名此地，后人因此尊称他为濂溪先生。此匾意在表明，周氏周氏乃是周敦颐嫡系中有名望、有地位的大家族。两旁顶梁柱上，则镌刻着周大璋所撰写的楹联：“家学渊源克振爱莲道脉；底规整飭何须细柳军营”。上联意指周敦颐有千古名篇《爱莲说》，其学问与学养誉满天下，鹤石周氏的子孙后代必定会继承并发扬其家学与家风的优良传统。下联则表明，鹤石周氏的子孙后代定会严格遵守家规家训，就如同西汉名将周亚夫在细柳军营中要求士兵遵从军规军纪那般公正严明，不容违犯。对于文官武将而言，生前可在祠堂中庆功摆谱；逝世后，根据其一生的功绩与品德，亦可在祠堂中树立匾额以示纪念。文官如周大璋、周芬枫等人皆有进士匾额悬挂；武将则有周南寿的“威镇黔南”大匾彰显其武勇。

鹤石周氏历来秉持着“崇文尚武”的优良传统。崇文方面，他们崇尚周敦颐、周大璋那般勤学苦练、博学多才之人；并坚持“穷不丢书”的信念，即便家境贫寒，也要供子孙上学读书，以改变命运。尚武方面，他们注重习武健身、耳濡目染，谨记在心。1948年春，周潭小学迁入周氏宗祠，我读小学六年级，乘机熟读祠堂牌匾和名联，细看祠堂建筑结构和装饰，祠堂的庄严美好形象，大致了然，成为抹不去的记忆。可惜，如今幸存八角亭孤零零地鹤立在山水胜境。几十年来，我回老家故地重游，曾先后多次凭吊周氏宗祠遗迹，默默伫立在八角亭前瞻仰，有时不禁潸然泪下。



何涛 作

